

红军长征集结地为何选择于都

□ 甘根华

江西有一座著名的县城，它的名字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就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所在地，赣南第一支红色武装、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全红县之一和巩固的后方基地——于都（历史上曾称“雩都”）。当年，红军在于都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活动旧址、旧居，如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中共赣南省委旧址、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长征前夕毛泽东旧居等。那么，红军长征集结地为何选择于都呢？

于都有更有利的地理条件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9、10月间开会讨论突围与转移的线路。在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在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域集结；在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唯有在南线，红军与陈济棠的粤军进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等5项协议，有利于红军经过南线。因而，位于中央苏区西南角的于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考虑红军集结和突围的首选地。另外，于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央苏区相对中心的位置，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再加上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比集结瑞金相对安全。

于都有更扎实的群众基础

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省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除瑞金外，于都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群众基础。首先，于都在扩红方面成果丰硕。于都是当时的扩红先进区，据《于都县志》记载，苏区时期，于都“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726人，参加地方红军的有11793人”。同时，书中还明确记载，1935年于都人口为254750人，到1936年10月锐减为175366人。由于有良好的扩红基础，长征前夕，于都县有近万人参加红军。其次，于都人民真心支持红军。当年，于都河有400多米宽，水深浪急，红军选中渡河的8个渡口中有5个需要架浮桥，而架设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船只和船工。为了帮助红军架桥，沿岸的百姓将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并先后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在短短4天时间架起5座浮桥。1934年10月，时任军委工兵营营长、指挥部队在于都架桥的王耀南在他后来的著作《坎坷的路》一书中，记录了几个于都老百姓支援红军的生动细节：“有一次，我正在指挥架桥，突然看到河滩上何立斌、刘调元几个同志和一个老大爷争吵，互相争抱几块木板。我当时心想，征集材料怎么能和老大爷吵架呢？为连忙跑了过去，安慰老大爷说：‘老大爷，板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我的话还没说完，老大爷更急了：‘这位同志啊，你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战士前方打仗，连命都拿出来了，我献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后来，王耀南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感慨地说：“多么好的群众啊！”又如，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宝金背着68公斤的发电机，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穿越雪山草地，走到了延安，毛泽东称他为“长征模范”。最后，于都人民真心保护红军。中央红军是怎样在4天内悄无声息地完成渡河的？时任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曾这样回忆：“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正是群众的无数只手、无数双眼，让敌人变得像瞎子一样。为防止敌军飞机侦察、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于都人民与红军工兵一起，头天傍晚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不留安全隐患。同时，近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还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直到所有红军官兵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敌军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正所谓“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可见，正是这种“军民团结一家人”的鱼水深情和于都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保护，才能使红军在短时间

内完成集结和转移。

于都有更雄厚的物质保障

在前4次反“围剿”中，于都一直不是主战场，被破坏的程度不是特别严重，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物质基础。长征前夕，中央红军大部在于都集结9天，补充了粮食和弹药等，为长征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据考证，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菜干、衣物等生活物资，加紧赶制了2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为红军准备了4天以上的口粮；收集大量子弹壳、铜锡、土硝、废铁等兵工材料供给红军；为了让红军休整好，他们还把最好的房子

腾出来给红军住。此外，据史料记载，长征出发时，国家银行随军担运了在于都等4县筹集到的数十担银元，这对红军长征时的给养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仍然悬挂着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反映了当年于都的妇女和老人们为红军赶做了一双双结实的草鞋，期盼红军官兵穿着草鞋打胜仗、早日凯旋的情景。

于都有更突出的军事优势

根据中央红军的突围计划，突围方向是中央苏区西南部赣粤边界。于都作为距这一道封锁线最近的苏区县，其集结运动方向与突围方向是一致的。在此集结和出发，有利于红军隐蔽和接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提高突破封锁线的成功率。据《于都县志》记载，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来于都……”在那段日子里，毛泽东深入茶梓、小溪、罗江等地，了解当地情况，为红军战略转移选择路线。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毛泽东认为，集结后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乘敌不备突破敌人在安远、信丰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时任少共（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后来在她的回忆录《在历史的激流中》写道，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将从北路进攻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从而避免遭到前后夹击，有利于为接下来的战略转移赢得更大的空间和争取更多的时间，也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的纪念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古代兵器“戈”式造型的建筑物，这就是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碑高30米，正面是刘华清的题词“为解放锦州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身上方是5颗五角星，下面是3束花环，碑身两侧刻着胜利鼓，背面是碑文。全文如下：

这里长眠着为解放锦州而献身的革命烈士。半个世纪前的锦州攻坚战，是震惊中外的辽沈大决战中关键一役。是解放军指战员，面对固守待援的国民党十万重兵，奋其智勇，前仆后继，冲越孤岗重峦，高城深堑，喋血明碉暗堡，列巷层楼，激战三十一小时，一举攻克锦州，时在公元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战略要地锦州的解放，加速了东北全境解放的进程，进而奠定了全国解放的基础。时届五十周年，改革开放，物阜民康。抚今追昔，长怀先烈。中共锦州市委深切关注，市人大作出决议，市政府精心筹划，社会各界踊跃捐资，选址于倚山面海、遥对新城、苍翠环抱的当年鏖战之地，建此陵园，集中安葬烈士忠骨，以慰英灵。荆山雄峙，凌水长流。锦州人民永远铭记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立碑永祀，垂范千秋。

公元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锦州市人民政府 敬立

敬读碑文，耳旁响起的是革命先辈们为解放锦州、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一阵阵冲杀声，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

“战锦方为大问题”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行到关键一年，人民期待已久的大决战终于到来了。这场大决战，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9月7日，毛泽东指出东北野战军的攻击重点应指向北宁路上的重镇锦州，暂时不要顾虑长春、沈阳的敌人。在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然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却徘徊犹豫于先攻打锦州，还是先攻打长春。中央军委一再指出，攻占锦州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所在。辽沈战役已经发起20天，部队兵临锦州城下之际，林彪再次动摇，提出回师攻打长春。毛泽东、周恩来看完电报后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接连复两电，斩钉截铁地指出，攻打锦州部署已经完毕，“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电报发出后一个多小时，中央军委收到了林彪放弃打长春最后下定决心攻打锦州的电报，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复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希望按照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

按照部署，东北野战军于10月13日肃清锦州外围守军，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如碑文所述，“激战三十一小时，一举攻克锦州”。

锦州攻坚战，对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辽沈战役才真正形成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大歼灭战。后来，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专门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指明锦州一战而关全局。锦州的解放，把东北的大门关上了，为接下来的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后来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这里长眠着为解放锦州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锦州攻坚战，全歼守军10万余人。同时，东北野战军自身也付出了代价，共伤亡2.4万余人。

在锦州，有一条街叫“士英街”，

决定战役走向的锦州攻坚战

——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纪念碑碑文敬读

□ 韩亚杰 钟波

为了纪念锦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梁士英而命名。梁士英是众多战士中为解放锦州而献身的

一个代表。

1948年10月14日10点整，对锦州城的总攻开始了。时为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五团三营八连二排五班战斗组组长的梁士英，顺利地突破了敌人一道道防线。就在关键时刻，铁路旁敌人的大碉堡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尖刀排经过几次拼杀，手榴弹打光了，依然没有成效。连队干部决定组织爆破，梁士英立即请战：“把任务交给我，我一定能完成！”

梁士英脱下棉衣，提起两根连接的爆破筒，带了两颗手榴弹，紧贴着路基飞快地朝前跃进。敌人的火力比以前更加凶狠，子弹把梁士英身前的泥土打得四处乱溅。经过一阵艰难的爬行，他终于来到离地堡左侧十来米的一个小土坎下面。梁士英立即向地堡甩出两颗手榴弹，趁着爆炸时的浓烟，他跳出了土坎，把爆破筒塞进敌人的地堡眼里。正当他转身要跳离地堡时，敌人却把爆破筒推出了枪眼。梁士英见状毫不犹豫地弯下腰，把瞬间就要爆炸的爆破筒拿起来，猛地又塞进地堡里，并用胸膛顶住爆破筒，像一个钢铁铸成的巨人一样，钉在那里屹立不动。“喋血明碉暗堡”，梁士英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和战友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6岁。

在锦州，还有一条街，叫云飞街，也是以烈士的名字命名。马云飞原名叶宗汉，曾担任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长期在锦州从事地下工作。解放锦州前夕，马云飞等深入敌人内部，搜集到包括锦州城防工事图等大量重要情报。总攻锦州时，马云飞为东北野战军三纵突击队带路，在突入敌人司令部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在了胜利前夕。

“部队精神好”

锦州解放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并致电称赞“部队精神好”，望传令嘉奖。是什么样的“精神好”，让毛泽东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多次讲到？

辽沈战役胜利8年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讲到解放锦州时“精神好”的故事。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纪律建筑在自觉性上，这便是让毛泽东多次称赞的“精神好”。从此，锦州苹果的故事，成为教育全党、全军的生动事例。

冀鲁边区如何开展统战工作

□ 马广峰

冀鲁边区形成于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以山东德州为中心，西起津浦铁路，南濒黄河，东临渤海，北抵天津独流减河，包括了当时隶属于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的20多个县，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是八路军挺进山东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创下了山东抗战史上的多个第一。冀鲁边区模范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多元化统战实践，使边区呈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进步力量要求抗战，伪顽势力有所分化并更加孤立”之局面，在党的统战工作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联合国民政府乐陵县县长投身抗日。1938年5月，牟宜之在其舅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介绍下，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为乐陵县县长。牟宜之来到乐陵后，胸怀抗日，组建抗日武装，镇压地痞流氓和土匪。但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压力下，其长期徘徊在“十字路口”。为此，边区军政委员会诚邀牟宜之共商抗日大计，并多次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策略。牟宜之看清了抗日的前途和依靠力量后，积极支持共产党抗日，并出资数万大洋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购置棉衣。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牟宜之的行为大为不满，对其处处压制。正在他苦闷彷徨之际，萧华率部来到冀鲁边区。在萧华的教育引导和动员下，牟宜之坚定了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决心，把县政府钱财积蓄全部交给八路军支配，将县政府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挺纵”泰山支队，使乐陵成为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牟宜之的行为，周恩来曾给予高度评价：“倘若在抗日战争伊始，中国有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力、财力、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孤立、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共力量。1938年9月，八路军“挺纵”到达冀鲁边区后，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密谋实施反共的“冀鲁联防”，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把八路军“挺纵”赶出冀鲁边区，以限制根据地发展。沈鸿烈来到鲁北后，以“统一政令、军令”为借口，打击边区抗日政权及军民，意图撤换“亲共”县长牟宜之。针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通过会谈的机会尽力说服沈鸿烈放弃成见、共同抗日。利用国民党第三路军手枪旅旅长吴化文与沈鸿烈的矛盾，与吴化文订立了互通情报、互相联络等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还组织万名群众阻拦沈鸿烈把牟宜之强行带走。最终沈鸿烈无功而返，退居鲁南。

与沈鸿烈的阴谋不同，鹿钟麟妄想用武力消灭津南的八路军，他收买了盐山反动民团头目孙仲文，指使其大搞反共军事活动，造成冀南军区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牺牲。针对孙仲文之辈顽敌，冀鲁边“挺纵”在对其多次教育、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予以坚决消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

团结争取国民党高树勋部抗日。1938年12月，蒋介石抽调高树勋部进入冀鲁边区，与八路军搞政治军事“摩擦”。高树勋是冀鲁边区盐山县人，本人倾向于抗日，因此常受顽固派排挤。萧华认为他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对其进行了积极争取。一是对高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萧华等“挺纵”领导数次前往高部驻地，与其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派人专程送信，恳切劝诫高树勋认清形势，

不要与石友三、张荫梧等辈为伍。二是对高部中马奎如等反共分子挑起的种种“摩擦”阴谋，予以揭露和坚决回击。以马奎如为首的顽固派，网罗地方武装袭击宁津县城，在高部掩护下四处暴力催粮派款，从而挑动八路军与高部发生冲突。对此，萧华等“挺纵”领导一方面在军事上给马奎如以迎头痛击；另一方面积极同高树勋交涉，成功使其与顽固派划清界限。1939年7月，高树勋部在乐陵宁家寨陷入日军重围，在向国民党军求援无果的情况下向八路军“挺纵”求援。“挺纵”的果断施救感化了高树勋，其不久便毅然率部撤离了冀鲁边区。1945年10月，任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树勋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成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位率部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对伪军伪组织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由于冀鲁边区艰苦的抗战条件与形势，特别是进入抗战中后期，部分地方武装或国民党军投靠日伪。对此，冀鲁边区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伪军工作总的方针政策，确定“打击、孤立、警告、分化最坏的，掌握利用较好的，争取、控制一般的”具体政策。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伪军工作：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过来，为我们做工作，或成为我们的武装力量；运用各种关系做伪军家属的工作，使做伪军工作成为家家户户的任务；对伪军采取喊话、写信、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加强攻心战；打击首恶，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军头目予以坚决镇压，惩一儆百，推动中间力量向抗日方面转化；破坏敌人的“保甲制”，争取和掌握伪政权，使其成为进行敌伪工作的桥梁。以上措施实现了对伪军“内线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